



国际学术前沿观察

#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

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  
周 琪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RONTLINE OBSERVING

#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

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美】 弗朗西斯·福山 著  
周 琪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RONTLINE OBSERVING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  
[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周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2.

(国际学术前沿观察)

书名原文：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ISBN 978 - 7 - 5004 - 7374 - 9

I. 美… II. ①福…②周… III. 保守主义—研究—  
美国—现代 IV. D097. 125.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2798 号  
图字：01 - 2007 - 5326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李 建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印 张 5.875

插 页 2

字 数 132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中文版前言

自从初版英文版《美国处在十字路口》精装本发表过后已经过去了一年半多的时间，在这一期间全球政治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这些情况使得本书中所概述的美国外交政策进退两难的局面变得更加严重。

本书的问世恰好是在2006年2月萨马拉市逊尼派阿斯卡里亚清真寺被炸之后，这一行动挑起了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无休止的相互暴力行动，并把伊拉克推入了事实上的内战状态。2005年12月举行伊拉克议会选举后直到4月份才产生出一个伊拉克政府，而且实际上直到2006年6月初最后一批部长才得到任命。建立政府速度缓慢是一个征兆，表明逊尼派和什叶派党派之间没有能力在权力分享、石油岁入，对军队和警察的控制，以及大量其他问题上达成任何基本的一致。到2006年秋，有一个广泛的看法认为，内政部即使没有被什叶派民兵组织所控制，也已受到其严重的渗透。此时，所有的人都应清楚地看到，正如一个被泄漏出来的《国家情报评估》(A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up>①</sup>所注意到

---

<sup>①</sup> 《国家情报评估》是美国情报部门对某项具体国家安全问题的最具权威性和最高等级的书面判断。它应一名行政部门的官员，参、众议员或军事指挥官的要求，由来自美国主要情报机构的代表参与撰写，然后提交给总统和其他决策者。——译注

的，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使整个伊斯兰圣战主义的恐怖主义问题比 2003 年前更为严重。尽管 2006 年 11 月中期选举的结果是反对战争的民主党人控制了国会两院，布什总统还是在 2007 年初运用其行政权力命令“急剧增加”美国的军力来最后一次推动“胜利”。然而，到此中文版前言撰写之际，胜利仍然遥遥无期。

在核武器扩散方面，情况也没有好转。2002 年 1 月布什总统提到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是“邪恶轴心国”，正在寻求发展核武器，对此美国不能容忍。我们知道，在布什发表讲话之时，伊拉克并没有制定一项积极的核计划，虽然 2003 年对伊拉克的入侵确实防止了伊朗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启动核计划的可能性。对伊拉克的入侵似乎也在劝阻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Mu' ammar Qadhafi）放弃其核计划中起了某些作用，虽然到 2003 年为止他是出于其他原因而走上放弃核计划的道路的。但是侵略似乎刺激了伊朗和朝鲜，使它们加速其核计划。它们认为，拥有核威慑会比没有核威慑更安全。结果，伊朗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预防体制退出，宣称它有权发展“和平的”核能力，朝鲜则采取了实际行动，试验了核炸弹，成为世界上第八个拥有核能力的国家。

2006—2007 年发生的这些不幸事件本应强化《美国处在十字路口》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些教训。布什政府及其新保守主义支持者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实现其中东所寻求的政治目的的能力，尤其是在广大范围实现其向民主过渡的目标的能力。美国目前的军事开支大约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然而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经过将近四年的努力、付出了数以千计的美国人的生命和大约 5000 亿美元的开支之后，美国仍未能成功地使一个仅拥有 2400 万人口的小国实现和平，而且更不像是正

在引导它走向一个成功的民主制。

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是同下述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全球政治的性质发生了重要的变化。20 世纪的国际关系是被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日本帝国、前苏联，以及欧洲殖民国家这样的强国所主宰，所有这些国家都可以对自己的领土拥有韦伯所说的对权力的垄断（虽然不一定是合法的垄断）。在这个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中，常规武器确实是有用的：它可以被用来摧垮那些处在国家等级结构顶端的人的意志：当他们承认失败时，你便获得了和平。

然而当今世界的特征，至少在一个从北非到中东、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再到中亚的不稳定地带的特征是，存在着大量贫弱的、有些是失败的国家，以及一些能够跨越边界流动的跨国活动者，那些导致全球化的技术能力同样促进了这些特征。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索马里、巴勒斯坦以及其他大量没有能力对其领土实行主权控制的国家，把权力和影响力让与了像基地组织这样的恐怖主义集团，像黎巴嫩的真主党这样的政党兼民兵组织，或其他地方形形色色的种族、宗派政党和派别。

这一局势显然使熟悉 20 世纪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的人们不知所措。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其于 2006 年黎巴嫩战争之后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断言：“真主党事实上是一个基地组织模式的复制品。它像一个国中之国一样公开行动……一个存在于国家土壤上的国家实体，具有国家的所有属性，并受到地区主要势力的支持，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现象。”<sup>①</sup>这其实不过

---

① Henry Kissinger, "After Lebanon," *Washington Post*, Sept. 13, 2006.

是一个相对新的模式：它的出现至今已经有 15 年，正如任何一个跟踪最近非洲政治的人所充分了解的那样。一般来说，像基辛格和布什政府这样精明的观察者对这一新现实的认识是滞后的，而其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在“9·11”袭击之后，政府中的许多官员不能相信，这次袭击可能是由一个非政府行为者组织的，因此他们在巴格达采取了搜寻袭击发起国的致命行动。他们如今把真主党看作不过是德黑兰的工具，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

在这个存在着贫弱国家、跨国民兵组织和恐怖主义集团的世界里，与 20 世纪强国主宰的世界相比，常规军事力量更少派得上用场。美国的军事理念强调采用突然和决定性地运用占压倒优势的兵力来击败敌人。但是在一个反叛者和民兵组织被无形地部署在平民人口当中的世界里，占压倒优势的兵力几乎总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它恰恰使那些本来倾向于同核心战斗者破裂的人异化，并否认了他们自由行动的能力。需要用来击败跨国民兵组织和恐怖主义者的那种反叛乱战役应把政治目标置于军事目标之上，强调攻心术而不是强调带来震惊和畏惧的效果。

在一个存在着贫弱国家的世界中，国家建设 (state building)<sup>①</sup> 成为一项关键任务。2003 年夏，布什政府突然省悟了这一事实。当时总统的顾问们意识到除非他们能建立一个有相当能力的伊拉

---

① 福山在本书中提到“国家建设”时，有时使用英文词“state-building”，有时用“nationbuilding”。这两个英文词对于福山来说含义是相同的，可以互换。福山把“国家建设”的概念定义为：“创建新的政府体制并加强现存的政府体制。”福山认为，国家建设对于当今国际社会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羸弱的或失败的国家是世界上许多最严重问题的根源，这些问题包括贫困、艾滋病、毒品和恐怖主义等。可参见 Francis Fukuyama,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ix. ——译注

克政府，否则美国便无法从伊拉克脱身。此刻，布什政府痛苦地发现自己在这种雄心勃勃的国家建设方面缺乏训练，只能匆忙应付。同样，如果黎巴嫩政府没有能力把其权力扩大到黎巴嫩南部，就不会有对这一地区真主党问题的长期解决方法。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不能转化为国家建设力量；实际上，对美国人使用常规军事力量作为工具进行直接统治的诱惑常常使地方同盟者被当作幼儿对待，从而阻碍了当地的国家建设进程。

从过去六年中应当汲取的第二个教训是，预防性战争不能成为美国长期的核不扩散战略的基础。布什主义寻求运用对伊拉克的预防性战争来警告可能的核扩散者：若接近核门槛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可惜的是，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本身付出了太高的代价，以至于它提供了一个恰恰相反的教训：美国常规力量的威慑效果并不大，如果一个国家试图跨越核门槛，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更小。

布什政府的官员，如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显然从1982年以色列对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预防性攻击中引出了错误的教训。这一行动事实上非常成功地延缓了巴格达的核计划，因此当1990年伊拉克决定进攻科威特时，它并不拥有核武器（可能这是萨达姆·侯赛因诸多战略失误中最大的一个）。另一方面，袭击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成功意味着这一行动永远不可能被重演。奥西拉克核反应堆位于一座地面建筑物之中，很容易被一架以色列的F16战斗机所摧毁。未来的核扩散者（包括伊拉克本身）将学会把他们的设施深藏在隧道和洞穴之中，并制造出许多同样的设施，同时寻求通过多种途径来获得核武器。美国情报部门完全不能正确评估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性质的事实，为我们未来能否采取干净利落的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阻止核扩散的能力提供了一个更为可信的指示。

应当从伊拉克战争汲取的最后一个教训是，当前的美国政府显示出在制定日常政策上相当无能。布什政府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是它在完成为自己确立的雄心勃勃的目标时表现得如此虎头蛇尾。在过去的两年中有许多著作问世，它们记录了令人痛苦的细节，表明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重建方面多么缺乏准备，多么迟钝地意识到它正在同各种叛乱作战，需要采取非常不同的军事力量和战术。<sup>①</sup>在伊拉克，布什政府的行动方式像一名患有多动症的病人。它成功有效地组织了某些关键事件，如2004年6月30日的主权移交，或2005年1月30日的选举。但是在这期间，它未能训练伊拉克武装，未能任命大使，也未能恰当地评估和检验合同商所承包的伊拉克建设项目。更重要的是，未能追究那些对各种失败负最直接责任的官员的过错。

从理论上讲，缺乏运作能力的问题可以随时间而改善，但是其在短期内对美国的大战略产生了许多重要后果。新保守主义理论家认为美国正在对世界行使仁慈的霸权，明智而果断地解决像恐怖主义、流氓国家以及侵犯人权这样的问题。这实际上等于向世界发出这样一种信息：“信任我们，我们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即使你不同意我们此刻的政策，你将来最终会看到我们是正

---

<sup>①</sup> 除了其他论著，可参见 George Packer, *The Assassins' Gate: America in Iraq*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5); Thomas E. Ricks, *American Military Adventure in Iraq*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6); Rajiv Chandrasekaran, *Imperial Life in the Emerald City: Inside Iraq's Green Zone* (New York: Knopf, 2006); and Bob Woodward, *State of Denial: Bush at War, Part III*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6).

确的。”但是，即使美国的朋友和盟国倾向于信任美国的良好意愿，它们也无法不对实际的政策执行和对美国所造成的严重破坏感到沮丧。2004年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曾经说过：“你不得不使用你所拥有的军队，而不是你想要的军队去打仗。”<sup>①</sup>同样，美国不得不以一个现有的政府，而不是它所想要的政府去制定政策——这种情况应使美国人在为自己设立过度野心勃勃的目标时更为谨慎。

美国在伊拉克的表现对美国的朋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那些同意参加乔治·布什的“志愿者联盟”的国家。可以说，大多数美国的联盟伙伴几乎都没有对伊拉克战争承担感情上的责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似乎说服自己大力倡导布什主义，但是他很难使其国民跟随他。像英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参战是出于传统的英语国家的团结感；日本是由于当它开始受到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压力时需要维持同美国的牢固关系。其他国家，如摩尔多瓦和哈萨克斯坦，可能有更加唯利是图的参战动机。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既非美国盟友，又非美国敌人的国家而言，布什政府对恐怖主义、伊拉克和中东地区的偏重从更广泛的角度讲实际上是福兮祸所伏。“9·11”之前，在美国间谍飞机被迫在海南岛降落后，2001年上任的布什政府仿佛正在走向同中国的对抗。虽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冲突，但布什政府内外的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号召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所有这些都“在9·11”之后发生了变化，当时美国突然意识到它需要盟

---

① Rumsfeld Briefing of Iraq-bound Troops, Dec. 9, 2004.

国，而且承受不起使更多的国家与之对抗的状况，除非它有这种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美国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国政策和东亚政策的特征是，对朝鲜核计划十分担忧，想要通过包括中国在内的六方会谈和这一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在经济上参与的实用主义方法来处理这一问题。虽然美国加强了美日同盟，但这并不是以中国为代价的。总的来说，布什政府回到了同样的与北京谨慎交往的政策之轨，这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向中国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特征。

布什总统将于 2009 年卸任，它所做的决定和新保守主义所倡议的政策将很快成为历史，而不再是当前的关注点。然而，存在的一个危险是，美国将突然把过度军事化和干预主义的政策变为过度被动和自我关注的政策。乔治·W. 布什的政策促使许多人转变成为其在国内的反对派，他们强烈地认为布什及其政府并非仅仅做出了低劣的判断，或出于良好意愿而犯了错误，而是从一开始就违法行事，而且不诚实，为此布什本人及其政府应当受到犯罪起诉。同时，总统的支持者并不愿从“9·11”之后的阶段汲取教训，而是通过非难那些不赞同他们观点的人的动机来继续一味地对坏消息作辩解。这种两极化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美国如今需要的是中间路线的政策，它应当把右翼强硬思想的某些东西与在美国之外世界的运作方式问题上更加现实主义的看法结合在一起。这是我写作《新保守主义之后》的初衷，而它现在仍然是我的目的。

弗朗西斯·福山

2007 年 6 月

## 2006 年版精装本前言

本书的主题是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基地组织对美国进行攻击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这是一个为我个人而设的主题。我长期以来曾自认为是一名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我与许多其他新保守主义者，包括那些在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中工作的朋友和熟人，有着共同的世界观。我曾在两个场合为前国防部副部长保罗·D. 沃尔福维茨（Paul D. Wolfowitz）工作过，第一次是在美国武器控制和裁军署，后来是在国务院；聘我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工作的事也是由沃尔福维茨负责的，当时他是这所学院的院长。我曾同他的良师益友艾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在后者的咨询公司潘·休里斯蒂克斯（Pan Heuristics）一起工作，并像后者一样在兰德公司作为一名研究人员工作了若干年。我曾是阿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学生，他本人又是《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作者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学生。我还是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在研究生院的同窗，并经常在他的父亲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创办的两个杂志上撰文，一个是《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另一个是《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 也经常在《评论》杂志(*Commentary*)上发表文章。

然而, 与许多其他新保守主义者不同的是, 我从来没有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信服过。我最初在伊拉克问题上采取相当强硬的立场, 1998年我在一封由“新美国世纪计划”组织(*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发起的公开信上签字, 敦促克林顿政府在萨达姆·侯赛因阻止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进入伊拉克后对巴格达采取更强硬的路线。然而, 那时入侵伊拉克并不在政策选择之中, 对战争的考虑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开始的。在入侵伊拉克的前一年, 我被要求参加一项对美国同恐怖主义作战的长期战略研究。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最终认识到伊拉克战争是一场荒唐的战争, 这一研究给了我一个机会来透彻地思考我在本书中所讨论的问题。自那时以来, 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来为自己的困惑寻找答案: 是我的观点已经有了太大的改变, 以致我不再有资格做一名新保守主义者, 还是支持战争的新保守主义者正在错误地应用我们仍然共同赞同的原则?

2004年2月, 当我参加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年度晚餐时, 我深切地感到我所信奉的观念与其他新保守主义者信奉的观念之间似乎存在着鸿沟。在这次晚餐上, 专栏作者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 (其专栏为多家报刊共用) 发表了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的年度演讲, 题为《民主现实主义: 为一个单极世界设计的美国外交政策》(“*Democratic Realism: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 a Unipolar World*”)。这次演讲是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将近一年后作的, 它把这场战争说成是几乎已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周围所有的人都热烈地为

演讲欢呼，因为美国在伊拉克并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陷入了剧烈的内乱，而且由于奉行克劳塞默所倡导的那种单边主义战略，已使自己几乎完全孤立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第二天，我遇见了当时担任《国家利益》主编的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我告诉他我想要写一篇批评文章。他当即同意，于是2004年夏我在该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新保守主义的时刻》（“The Neo-Conservative Moment”）的文章。

我在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个政治标志和一种思想的新保守主义，已经演变成某种我不能继续支持的东西。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要表明的，新保守主义曾建立在一套逻辑连贯的原则基础上，这些原则在冷战时期曾产生了一些总的来说明智的国内外政策。然而，这些原则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被用来对美国过分强调使用武力并由此推演出伊拉克战争的外交政策辩护。新保守主义此时已经被无可挽回地同乔治·W. 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任何想重新阐述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更重要的工作在于超越布什政府及其新保守主义支持者的遗产来重新界定美国的外交政策。

本书是为阐明新保守主义遗产所做的一个努力，它试图解释在我看来布什政府做错了什么，并勾画出美国同世界的其他部分打交道时另一种可能的方式。这也促使我努力开辟一个新的网页来解答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问题，网页的标题为“美国利益”（The American Interest），网址为 [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我想要表明立场不受当今关于美国外交政策辩论中任何一派的左右，而且我认为这一立场将赢得相当广泛的美国人的支持。我

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威尔逊主义”，我必须承认这并不是一个恰当的称呼，因为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威尔逊主义的遗产都是被赋予了大量含义的概念。如果有人能想出更好的标签，欢迎同我联系告知其建议。

细心阅读过我最初对克劳塞默批评的读者会发现，本书没有提及我过去的一个观点，就是某些新保守主义者如何吸收了以色列的强硬战略思想，并且在我看来不适当地将这一思想应用在了“9·11”之后美国所面临的局势上。这对于查尔斯·克劳塞默来说尤其如此，我与他之间后来所进行的意见交换使我确信在这一点上我是对的。我认为，他关于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威胁的预言性看法是错误的，其原因我将在第三章中加以说明。但是这一观点虽然适用于某些个人，却不能更广泛地用于新保守主义者，也不能用来诠释布什政府的行为。在许多关于巴—以冲突的事情上我希望布什政府采取的是不同的做法。不过，我并不认为在布什政府第一个四年任期内存在大力推动巴—以冲突最终解决的有利环境。只要亚瑟·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还活着，巴勒斯坦临时权力机构就几乎不存在政治改革的机会，也不存在产生一个可以达成并实施与以色列之间和平协议的巴基斯坦对话者的机会。对布什政府在这一议题以及其他新保守主义议题上的真正检验将在其第二任期中以色列从加沙撤军之后出现。

本书中的资料是我最初于2005年4月11、12和18日在耶鲁大学所作“卡斯尔讲座”（Castle Lectures）的内容。我想要在此感谢主办这一系列讲座的伦理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项目（Program in Ethics, Politics and Economics）及其主管赛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是他最初邀请我来作这个讲座的。我也非常

感谢约翰·K. 卡斯尔 (John K. Castle), 他创办了这一系列讲座以纪念其先辈詹姆斯·皮埃尔波因特 (James Pierpoint) 牧师。

当本书的手稿问世时, 许多人对它作出了评论或其他反应, 包括罗伯特·博因顿 (Robert Boynton)、马克·科多佛 (Mark Cordover)、查尔斯·戴维森 (Charles Davidson)、希勒尔·弗拉金 (Hillel Fradkin)、亚当·加芬克尔 (Adam Garfinkle)、约翰·伊肯伯里 (John Ikenberry)、罗杰·利兹 (Roger Leeds)、马克·利拉 (Mark Lilla)、麦克·曼德尔鲍姆 (Mike Mandelbaum)、特里塔·帕西 (Trita Parsi)、马克·普拉特纳 (Marc Plattner)、杰里米·拉布金 (Jeremy Rabkin)、斯蒂芬·塞斯塔诺维奇 (Stephen Sestanovich)、艾布拉姆·沙尔斯基 (Abram Shulsky)、汤姆·怀特 (Tom White) 和亚当·沃尔夫森 (Adam Wolfson)。我还想要感谢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和史蒂文·史密斯 (Steven Smith), 他们代表耶鲁大学出版社对我作了访谈。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约翰·库尔卡 (John Kulka) 在成稿过程中提供了可贵的指导。我曾经从同斯蒂芬·霍斯默 (Stephen Hosmer) 的大量谈话中受益匪浅, 他是我所认识的在美国对发展中国的政策问题上最有智慧的人之一。对被本书最终所采用的观点和讨论做出贡献的许多其他人 (无论他们是否知道这一点), 包括彼得·贝克威茨 (Peter Berkowitz)、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库尔特·坎贝尔 (Kurt Campbell)、埃利奥特·科恩 (Eliot Cohen)、伊沃·达尔德 (Ivo Daalder)、麦克·德希 (Mike Desch)、巴巴拉·黑格 (Barbara Haig)、利昂·卡斯 (Leon Kass)、汤姆·基尼 (Tom



Keaney)、托德·林德伯格 (Tod Lindberg)、罗布·利特韦克 (Rob Litwak)、约翰·米尔希默 (John Mearsheimer)、内森·塔考夫 (Nathan Tarcov) 和肯·温斯坦 (Ken Weinstein)。我的妻子劳拉·霍姆格伦 (Laura Holmgren)，从一开始就怀疑这场战争，我从同她的讨论中得到了很多益处。我的助手辛西娅·多罗伽兹 (Cynthia Doroghazi) 在这一项目的各个阶段都给予了我帮助。卡洛斯·哈曼 (Carlos Hamann)、艾娜·霍克斯哈 (Ina Hoxha) 和克里斯托弗·莫纳斯特斯基 (Krystof Monasterski) 是我的研究助手。最后，我非常感谢我在国际创造性管理公司中的各位出版代理人：埃斯特·纽伯格 (Esther Newberg)、克里斯蒂娜·鲍奇 (Christina Bauch)、贝特西·罗宾斯 (Betsy Robbins)、玛格丽特·霍尔顿 (Margaret Halton) 和利兹·艾弗森 (Liz Iverson)，是他们的帮助使这本书的出版成为可能。